

評 Tze-ki Hon, *The Allure of the Nation: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Debates in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Leiden; Boston: Brill, 2015. x+167 pp.

黃琬柔*

本書作者韓子奇(Tze-ki Hon)教授目前任教於香港城市大學，其研究橫跨中國古代至近代。從韓子奇教授過去出版的十幾篇近代史論文看來，中國現代性與清末中國如何加入世界體系的議題，始終是他關注的焦點，本書可說是此關懷的延續，勾勒清末至 1930 年代，知識分子試圖構築的國族(nation)與國族現代性(nationalistic modernity)。作者特別強調近代中國國族圖像的多元與複雜，以避免落入過去在討論近代中國國族發展時，由辛亥革命到五四，並且下接共產革命這種直線發展的線性目的論。在此作者分別呼應了兩個學術界的反思：其一是李澤厚與劉再復的「告別革命」；其二是西方學界由「後現代」思潮引發的對「被壓抑的中國現代性」的興趣。

為了呈現出近代中國國族與國族現代性的複雜度，作者運用了兩組相輔相成的概念貫串全書，分別是國族(nation)與政府(state)、體與用。nation 指國家或國族，state 指政府。nation 與 state 之間暗含著知識分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子與政府控制間的角力，當知識分子對 nation 的定義與政府相左，通常意味著知識分子對政府的抵抗。nation 正可以用來表示一種每個人對社群有著不同的想像，但仍能共享的普遍認同，作者在第二章到第六章就討論 nation 如何被不同的知識分子重新定義。作者也指出 nation 與 state 並非單純的對立狀態，nation-state 這個詞彙表明兩者有更複雜的、無法一刀劃分，並且無法完全壓倒另一方的關係。

相較之下，體與用這一組概念更多被用來分析中國與世界體系的關係。「體」與「用」的確切內容和意涵是不固定的，隨著對國族現代性的不同想像，體與用也隨之變遷。如何把握這兩者，以及兩者間的關係，意味著近代知識分子如何在與世界體系聯繫的同時，保有中國自身的主體性，並維持兩者間的平衡。

全書是由多篇論文集結而成的論文集，除去前言與結論，共分七章。在第一章中，作者反駁過去對張之洞(1837-1909)與《勸學篇》的一種成見，即認為該書是為了批判康有為(1858-1927)、梁啟超(1873-1929)等革命派而作；作者認為恰好相反，《勸學篇》的目的在於以「體用說」彌合當時明顯分裂的新派與舊派士人群體，張之洞分別批判雙方是「不知本」與「不知通」，並在不可變的三綱之上，以「體用說」進行可謂相當激烈的改革。作者在後續章節中反覆論證「體用說」如何成為後來意圖維持中國主體性，並同時與西方世界對話者的一道處方箋。在第二章對柳詒徵(1880-1956)《歷代史略》、夏曾佑(1863-1924)《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與劉師培(1884-1919)《中國歷史教科書》的分析中，作者就以同樣出現的「黃金三代」觀，指出他們雖然皆採用了上古、中古、近世的三階段分期法，卻未全盤接受線性進化史觀，而是以古代作為現代理想政治的根基。

第三章作者較全面追索了「中國民族西來說」從西方到日本，再傳入中國的流變，以及西來說在中國從清末到一戰後的變化。清末革

命黨人援引「西來說」作為革命工具時，也將周代政治思想與近代歐洲相比附，認為兩者具有相當的親近性。惟當時中國士人的目的，在以此證明漢族乃是淵源於西方移民，非但擁有高於滿族的文化與血統，也代表漢族與西方人有同樣的起源。然而「西來說」作為中國知識分子認識國際秩序，以及在國際秩序中定位自身的解釋理論，隨著對世界體系認知的變遷，也從最初的普遍被接受，或成為被批判的目標，或反過來成為漢民族曾到西亞殖民的證據。

第六章作者分析新人文主義是如何被學衡派學者抽離原先的西方脈絡，移植到社會條件與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國，成為反五四的武器。作者提醒我們，學衡派絕不能以單純的「保守主義」視之，藉由新人文主義來自西方又批判西方的特徵，他們一方面獲得與五四反傳統談判的資格，又以此反對五四反傳統的全盤西化，開出一條能夠使傳統與全球對話，並有別於五四的現代化道路。學衡派內部如何解釋新人文主義也是多元分歧的，作者認為，這表示中國現代性的複雜還有進一步梳理的空間。

第四、五、七章，作者分別討論了柳詒徵、顧頤剛(1893-1980)與陳寅恪(1890-1969)的中國史書寫。第四章以柳詒徵《中國文化史》為主，藉由中國過去與印度佛教、西方傳教士的交流，柳詒徵試圖證明中國始終是一個開放世界，從傳統中國與外來文化的對話中，柳詒徵看到了現代中國與西方對話的契機。柳詒徵認為，要建立現代的新政治或社會系統，必須包含傳統禮治的體制。第五章作者則分析顧頤剛的古史辨與民俗學研究，指出這兩個研究領域的中心思想，皆在試圖論證中國是「多樣與複數的中國」。第七章中，作者討論陳寅恪如何重新借用「體用說」來面對 1930 年代的中國。陳寅恪認為中國的發展必須奠基於外國文化與現存傳統的平衡上，隋唐時期與近代中國皆是外國勢力盛行的時代，因此唐代「開放帝國」的歷史相當值得借鑑。執

此而論，陳寅恪的隋唐史研究其實是一種歷史比喻，用意在回應當時五四反傳統聲浪。作者也分析了知識分子如何體現出有別於中央政府的獨立性。第二章作者就已經指出柳詒徵、夏曾佑與劉師培的教科書，在晚清「新政」試圖動員地方成為國家的一部份時，如何提出各自的「地方自治」以與中央政府平衡。到了第四章，柳詒徵挪用傳統的「禮治」作為現代政府的根基，不只是為了對應西方，更提供一套理想的地方自治體系與中央政府抗衡。史觀的衝突同樣構成對中央政府的挑戰，第五章顧頡剛所謂多樣與複數的中國觀，就違背了漢族中心與強調自古以來大一統的國民黨史觀。陳寅恪則藉由隋唐史的研究，認為種族認同能夠經由思想與生活模式而改變，這種以文化定義認同的看法，與柳詒徵相互呼應，也等於是否定了國民黨史觀。

本書可說是一本結合思想史與史學史的著作，在西方學界，像本書這樣綜論清末到 1930 年代史學的專著，可說相當少見。但也必須特別指出，本書乃是作者將過去十幾年間發表過的論文集結而成，故對某些議題無法充分討論，或某些篇章與作者在前言設定的分析架構無法完全契合，此乃論文集的形式所難以避免。以下個人提出的幾點疑問都與此原因有關。本書以知識分子如何在史學書寫中建構 nation 作為分析主軸，勾勒出史學家如何抗衡當時被視為「中央權威」的史觀，呈現其書寫中的政治意圖，確實提供了較為不同的切入視角。過去這種觀點的討論多集中於清末革命黨人，畢竟清末革命黨人的歷史論述具有相當強烈的反滿革命企圖，¹作者更進一步指出了如柳詒徵、顧頡剛、陳寅恪等人與中央政府間論述的角力，是本書的特出之

¹ 參考鄭師渠，《晚清國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頁 39-40；王汎森，〈清末的歷史記憶與國家建構——以章太炎為例〉，《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3），頁 95-109。

處。相較於諸多近代史學史皆以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的興起作結，本書亦論及當時幾位史學家的史學觀點與馬克思主義史學間的差異。較為可惜的是，本書不論是對國民黨史觀，或對馬克思主義史觀的比較與批評，皆著墨不多，只有在第四章以戴傳賢為例稍加說明。究竟作者在本書中所謂相對於知識分子的「中央」或「國民黨史觀」是什麼？若能有更多具體的分析與論述，或許讀者能更深刻的理解作者的觀點。

張之洞的「體用說」，以及「體用說」在近代中國的援用，亦是作者的主要分析架構之一。作者認為張之洞的改革在當時堪稱激烈，其「體用說」僅是為了維持中國主體性與西方新學間的平衡。關於張之洞「體用說」是激烈或保守，學界其實已經有諸多討論，結論雖然莫衷一是，亦有不少人贊同張之洞並非單純的保守主義者，²對學衡派也已經有跳脫純粹保守主義觀點的研究。不論如何，本書以「體用說」來概括意圖維持中國主體性的改革者，但這似乎使他們彼此間的異同、性質的差異淡化許多。誠然，作者在第七章曾指出陳寅恪的「體用說」，不論中西層面都較晚清深入，也不具有晚清那樣的中國中心主義，顯見其「體」較張之洞更為寬泛且靈活。但個人認為，「堅持

² 大體說來，強調張之洞並非守舊而是傾向改革者，羅志田《國家與學術——清季民初關於「國學的思想論爭」》一書，就著墨於張之洞開新的一面。蔡振生則認為張之洞《勸學篇·內篇》仍舊以護衛清王朝及崇儒衛道為主，但在《勸學篇·內篇》仍提出了不少改革，可說《勸學篇》仍以調和新舊為基本立場。另薛化元亦對張之洞的「中體西用」有過分析，但該書以為「中體西用」乃是晚清士人在面對中西文化衝突的一種思想潮流，張之洞的「體用說」只是這個思潮中的一部分。羅志田，《國家與學術——清季民初關於「國學的思想論爭」》（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頁 107-118；蔡振生，《張之洞教育思想研究》（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4），頁 247；薛化元，《晚清「中體西用」思想論——1816-1900》（臺北：弘文館，1987），頁 163-206。

中國傳統中有某種不可變動的事物」與「進行改革時必須包含中國傳統」兩者似乎不太相同，能否皆以「體」一字概括？更遑論張之洞、柳詒徵、吳宓(1894-1978)、陳寅恪等人的文化主張與立場迥然有別，而時代背景與社會環境亦相隔甚遠，若將他們放在同一條脈絡下討論，恐怕需要更進一步的析論與釐清。

作者始終關懷中國現代性的課題，在書中也指出中日間在近代的交流，呈現出有別於歐美的「東亞現代性」，可說是回應了本書前言中對現代性議題的反思。但是何謂「東亞現代性」？是否中國現代性與東亞現代性是兩種類似的概念，或作者認為「東亞」的現代性是一致的？³作者將中國現代性從線性式的、以西方為中心的模板中拉出，卻又彷彿另行將「中國」現代性置入「東亞」現代性中，是否會造成另一種誤區？故此，關於現代性、中國現代性或東亞現代性等詞彙的意涵詮釋與比較討論，或許可以期待作者將來的進一步說明。最後，本書有兩處較為明顯的中文錯字，頁 18「許」仁鑄應為「徐」仁鑄，頁 63「性」應為「姓」。

(本文於 2017 年 9 月 19 日收稿，2018 年 3 月 16 日通過刊登。

本期原訂 2018 年 3 月出刊，因故延至 2018 年 7 月出刊。)

³ 比方說王晴佳在“China’s Search for National History”一文中，就認為所謂「國粹」一詞雖然是源自日本，但中日兩方運用國粹追求的「現代」是有差異的。日本在討論國族認同時，強調日本獨特的特徵與精神，而中國的國粹學派學者們，帶著更強烈的傳統文化與歷史觀點來建立國族。Wang Q. Edward, “China’s Search for National History,” in *Turning Points in Historiography: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ed. Wang Q. Edward and Georg Iggers (Rochester: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02), 185-208.